

多学科合作助力中国考古深入发展

本报记者 付裕

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是2023年度田野考古的杰出代表。参加终评的22个项目重大发现不断“填补空白”“改写认知”，呈现了我国考古事业加速发展的景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近年来，多学科研究在考古中的应用不断深化，对遗址的深入认识，与多学科合作密不可分。



玉瑛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出土

探寻历史密码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的充分利用，生动再现了为应对冰期、间冰期交替出现带来的环境变迁，远古祖先不断调整适应策略及维系方式的历史场景。这也系统地完善了海岱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和旧石器技术发展过程。跋山遗址使用石英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文化特点，发展到距今约3万年水泉峪遗址出现细石器技术，经凤凰岭遗址、扁扁洞遗址传承发展，而后开启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基础最漫长的阶段，涉及人类共同的兴趣，具有高度的国际性，中国在关键区域、关键时段的发现一直被世界所关注。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各阶段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明显，存续多个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时期的居址空间利用模式揭示了该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珍贵的

人骨遗骸、丰富的海陆动植物遗存，以及确凿的农业证据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于1970年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2015、2016和2023年进行了三次发掘。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其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多数器形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遗物中自始至终网坠比例都很高，结合采集和筛选的大量水生动物和少量的陆上动植物遗存，说明了生计方式上，渔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是以屈家岭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该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黄土台基和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考究的“磗墩”，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磗墩”，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

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葬俗独特，存在多组墓葬同的“有意打破”现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组玉圭具有礼器的性质，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直观反映。遗址陶器群类型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并具有鲜明地方风格，代表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豫东地区的新类型。

助力考古持续深化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出土了类型丰富的成套青铜酒礼器，展现了早商时期最为完整的酒礼器组合，代表了早商礼仪制度和礼仪文化的最高规格。发现的黄金绿松石牌饰，与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在镶嵌工艺等方面一脉相承，是二里头文化以来嵌片绿松石高等级礼器的巅峰。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

辕车实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深入影响。对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时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祭祀建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秦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期天坛、地坛等祭祀建筑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山西霍州陈村窑窑址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残片和窑具。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建立了霍州窑历史分期标尺，掌握了各期的产品面貌和工艺技术特征，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的工作。这一发现充分展现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苏维埃大学司法工作班木门牌

钟同福



▲此木门牌在1955年由瑞金革命纪念馆征集入馆，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块1933年苏维埃大学司法工作班使用过的木门牌。

该牌为木质匾式，长197.5厘米，宽45厘米，厚度4.4厘米，正面刷有红色油漆，从右至左刻有“苏维埃大学司法工作班”十个大字，隶书体，阳刻黑油漆填写，表面油漆大部分脱落。斑驳的木门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红色司法的历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家的各种法律、法令，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国家司法工作。此后，各级地方和军队的司法机构也纷纷建立，

使苏维埃司法机构逐渐趋于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在艰苦卓绝的苏区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司法活动。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司法队伍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中。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干部、裁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法律常识，因此在工作上常发生许多困难，造就司法工作人员实在是一件迫切应做的事情，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后应当尽量造就司法工作人员，以充实各级裁判部。”为了造就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才，从1932年冬开始，在位于沙洲坝的最高法庭大厅内就地举办最高法庭司法训练班。闽西苏维

埃政府也开办了司法干部训练班，进行苏维埃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宣传。训练班主要学习《裁判部暂行组织与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惩治反革命条例》等。

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委会决定开办以培养苏维埃高级干部为宗旨的苏维埃大学，由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等组成苏维埃大学委员会，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从1933年9月开始招收学员，先后共招有1500余名，分特别班和普通班。

特别班内设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班，1934年春又增设外交、粮食班。普通班先补习文化，

再升入本科学习。司法班主要教学《土地法令》《劳动法》《婚姻法》《经济法令》等。1933年8月至12月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再次提到：“提高和训练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计划地训练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机关内做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每天以一定的时间学习，每次去巡视工作回来，都给他们以几天的训练，在这样的训练当中来造就干部。”“开办军事裁判所训练班，以充实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此时也开始积极吸引劳动妇女做裁判工作，当时中央司法部创办的《裁判半月刊》第6期中就对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曝光，还根据情节移交相关部门处理，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司法队伍的建设。



陈延香：一心为国 心系桑梓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市同安区祥和街道阳翟社区，有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闽南传统红砖厝，带双边护厝，天井中建有卷棚顶方形书亭，古朴中透着书香气，这是一心为国、心系桑梓的辛亥革命先驱陈延香的故居。

陈延香（1887~1960年），字澄怀，晚年号慧香居士，厦门同安区阳翟人，其父为清末秀才、乡村塾师。陈延香少年时期随父就读，19岁时父亲病故，陈延香继承父业，在灌口、角尾一带任塾师。

清宣统二年（1910年），陈延香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与陈仲赫等人组织青年自治会，打出同安革命军旗号，与庄尊贤率领的灌口革命军里应外合，于9月29日光复同安县城。民国2年（1913年），陈延香被推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民国4年，陈延香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通缉。袁世凯死后，陈延香复任议员至民国15年。这期间，他把所提议案、质询书及往来文牒编成《延香建言录》，全书24万字，这是研究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同安乃至福建省历史的珍贵史料。

陈延香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挚友。1913年，在陈嘉庚的鼎力支持下，陈延香献出祖产“坦

园”，创办同安城区第一所民办近代学校“阳翟学校”，兼任校长兼国文教员。1924年，他又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创办同安历史上第一所中学“同安公立中学”（今同安一中的前身），兼任校长和教员，陈嘉庚是该学校的永久校董。后来，陈延香被陈嘉庚聘任为集美学校总务主任兼女子小学校长，代理集美中学和师范学校校长，参与筹建厦门大学。

陈延香办学非常用心，曾先后4次到南洋劝募教育基金10多万元。陈延香每到一个地方，都认真考察当地学校的教育情况，包括设备、师资等，还与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一同到江浙地区考察当地教育。他吸收各所学校的优点，制定教育计划，立校训、作校歌，既注重传统孔孟儒家学说的诚仁教育，也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洋为中用，尊重并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开创了现代教育之先河。1929年，陈延香在同安公立中学校园内建造“爱国华侨捐资办学纪念馆”，并种植龙眼、荔枝和柏树，以期祖国教育如翠柏万年常青、似荔枝硕果彤彤。

陈延香还热心家乡的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开设仁爱医院和公中银行，参与筹建陈嘉庚倡议开辟的同安——集美公路。1960年，陈延香病逝，享年74岁。



▲陈延香故居

《荷花屏风仕女》：张大千工笔重彩精品

本报记者 付裕



▲张大千《荷花屏风仕女》
1966年作

张大千工笔重彩《荷花屏风仕女》画作全幅不论章法与造型，都相当具有现代感。人物造型采用半身近距离特写镜头，作侧身转头、回眸顾盼的动态姿势，贴近观者，几乎脱框而出。如此引人注目的表现方式，在传统人物画中极为少见。张大千创作古妆仕女图时，尽

量使其生动，转首回眸也是他常用的手法，但此画借用了浮世绘的人物表现技法，加衬以荷花屏风，为大千所活用，结合十分现代感的构图，成就了他彩墨人物特写比较少见的一种型式。

《荷花屏风仕女》虽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半幅画面却被荷花所占。左下方一朵即将绽放、如人头般大小的荷花，尖头的花瓣同人面一样白底衬微醺的醉红，浑圆而有弧形的立体效果。

据了解，张大千此画在起稿时，在上方荷花的右方还有一瓣荷花，造型与大小和下方那朵相类，但此一横出的花瓣过于靠近人脸的白额，反而无法凸显女子的主题，故以荷叶墨色掩去，但原稿仍隐约可见。由此修改，更可看出用心。

《荷花屏风仕女》的收藏者张葆萝为张大千的第三子，出生于安徽郎溪。他除陪伴父亲、随侍笔砚外，还为大小事务打点奔走，深得张大千信赖。

《荷花屏风仕女》在香港苏富比2024春拍中最终经过9口竞价，以1500万港元落槌，加佣金以1860万港元成交。



唐代白釉双龙耳瓶

唐代白釉双龙耳瓶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颈上突起5道弦纹。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

双龙耳瓶是唐代流行的瓶式，除白釉外还有青釉、唐三彩等品种。此瓶施半截白釉，形制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端庄典雅的形体展现了大唐盛世的神韵。

►白釉双龙耳瓶，唐，高42.7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0.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